

殖民地的帝國描圖： 評《「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 時空、知識與情感》^{*}

陳偉智^{**}

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12月。328頁。

壹、前言

對於帝國與殖民主義的研究，在近20年來的西方歷史學界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或是帝國轉向（imperial turn）的歷史學知識潮流的影響下，除了研究領域從以往的軍事擴張、政治制度、或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與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領域的歷史研究，轉而重視社會文化史的領域，這些新興的討論使我們能更豐富地瞭解帝國與殖民的複雜歷史現象。而這樣的史學研究重點的轉移，不單只是討論以往未被討論的領域而已，新的學術興趣與研究趨勢往往也具有在方法上或理論上反思並更新先前研究典範的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7年10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17年11月28日。

^{**}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企圖心。從史料的使用、解讀與研究方法、乃至探究新領域以及提出新視角，在在都不同於以往的歷史學風格。¹《「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即是屬於試圖透過新的方法與視角，討論日治臺灣殖民地史新趨勢的論文集。

這一本論文集是臺灣新生代學者跨領域的集體書寫殖民地歷史的成果，使用了包含檔案、殖民文書、日記、報紙、圖像、文學作品等作為分析素材。各篇論文從社會學、歷史學、文學史、思想史、法律史、藝術史、演劇史、文學批評等不同的知識領域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轉變，雖然各篇論文有各自的射程，同時也共享許多知識反思，並交織出對殖民地歷史的共同研究策略。

在評論本書的內容之前，先指出本書的一個特色，亦即本論文集反對在帝國與殖民研究中常見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二元對立的成說。在殖民地臺灣的近代歷史脈絡中，雖然日本vs臺灣往往看似一個不需要討論的歷史框架，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立，常常被當成歷史知識建構的一個先驗性的存在。這樣的架構，總也預設了殖民與被殖民經驗是兩個對立的「民族」或「國家」之間的統治與反抗的歷史。而這裡的「民族」與「國家」，更是被當成先於歷史分析而存在的實體。而這本論文集的特色即在於重新檢視殖民過程中，在地的交錯複雜的生活經驗，將之從原先在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中被過度簡化的被殖民歷史整體，加以解放。反對先驗的、未被歷史化的「主體」，不管這樣的主體是一個民族、一個社群、一種制度、一種美學風格、或是一個文化系統，並進一步建構重層與多元的殖民地臺灣的歷史圖像。

¹ 關於文化轉向或是帝國轉向，乃至於新帝國史的研究，參考晚近3位從事新帝國史研究的主要學者編著的專著，見Catherine Hall ed., *Cultures of Empire: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Stephen Howe ed., *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Antoinette Burton, *Empire in Question: Reading, Writing, and Teaching British Imperi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國內學界也有不少重新檢討臺灣的多元構成與重層影響的歷史經驗的實證研究，最近的例如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國內比較文學、文學史、文化研究乃至後殖民批評與此相關的著作，更是不少。

貳、殖民地臺灣的多元歷史面向的描圖

本書除序章之外，全書分為3部，分別為第一部「空間與時間意識的描圖」、第二部「知識與知識社群的描圖」與第三部「藝術與感情結構的描圖」。透過對殖民地社會不同範疇的描圖，作者們使帝國的作用在殖民地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被問題化也被歷史化。因此，「描圖」（mapping）不單只是敘述用語，而是這本論文集強調的分析方法，在方法上強調空間性閱讀與分析策略。這種方法論上的自覺，是這本論文集的特色之一。以下，先介紹《「帝國」在臺灣》各章的內容，接著討論此一論文集的貢獻與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在序章〈臺灣的後殖民問題：重新閱讀及面對臺灣歷史經驗與文化現象〉中，論文集編者李承機與李育霖展現與既有的殖民與後殖民歷史研究與理論對話的企圖心，並勾勒臺灣在地經驗的可能貢獻。做為論文集題目中的「帝國」，並不僅僅指稱對立於殖民地的政治與文化統治體，而是採取將「帝國」與殖民地的文化相關性視為相互採用、指涉、交疊，甚至是相互依存的關係與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的歷史主體性的話，則是「帝國」與「臺灣」同時是在各種賦予文化意義的過程中相互建構出文化的「主體」。試圖呈現「臺灣」這個「主體」裡，含括與「帝國」相交涉或交混的累積過程。從而近代史中的日本帝國對「臺灣」的影響已不是只有在「支配vs被支配」的關係項，反而往往在意圖之外，促使「臺灣」在建構文化「主體」時，多方且多重自我參照（self-referential）乃至挪用（appropriation）的對象。（頁13-14）不單是「日本」，近代以來曾與臺灣交涉的「帝國」經常是複數的，因此《「帝國」在臺灣》這一書名不限定特定帝國，意圖納入複數「帝國」在臺灣所衍生相關議題的視野。

序章特別說明本論文集的方法論，稱之為「殖民地的帝國描圖」，在分析與研究策略上，其強調殖民地的歷史現場本身所具有的「空間性」。以殖民地為基礎的「帝國」描圖嘗試呈現殖民者的「帝國」修辭與殖民地社會文化之間的拮抗、競合、交疊，甚至是相互指涉與相互形構的圖像。（頁14-15）描圖的方法，特別是支配與反抗文化間的交互影響，則是借用薩依德（Edward Said）的「文化地形學」與「對位閱讀」概念，類比西方音樂學中的對位法，兩個主題彼

此衍生、爭勝與交替呈現的原理與方式，閱讀帝國與殖民地的文學或創作。除了引用薩依德看法外，也引用傅科（Michel Foucault）的考古學與系譜學概念，說明描圖的「空間性」策略，不只包含前述「帝國」與殖民地關係之間的地理空間意義，也包含歷史現場裡各項「配置」或「布置」的相對關係。此一傅科式的「描圖」，非單純只是模擬或複寫，而是一種建立「配置」原則和知識的過程。（頁16）而本論文集的目的在於：1. 殖民地的帝國權力描圖；2. 超越既有的二元對立的殖民史研究；以及3. 透過重探殖民歷史，摸索思考未來的時間與歷史的路徑。

第一部「空間與時間意識的描圖」中包含了兩篇論文，第一章蘇碩斌的〈空間治理與地方夾縫：日本近代帝國統治下的臺北社會演變〉中，透過對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臺北的空間治理的效果與影響的分析，指出清末臺北3街市的社會形態，是置身「中華帝國」統治而生的在地共同體社會（地方社會），到「日本帝國」藉由習自歐美的近代統治術，改變了原先臺北的地方性格，塑造出均質性的「空間社會」。然而近代都市空間的形成，並不意味著地方社會必然成為被動無力的被統治者，他們反而在各種迂迴對抗中塑造出新的空間觀，並擴展民間生活的網絡，這些新的空間經驗，奠定了1920年代之後各種全島性抗爭的基礎。（頁26）日本近代帝國在臺灣的空間改造，是設計精良並執行有效的治理術，臺灣原先的地方社會也被徹底改造，但是地方力量並不全然無能為力。從臺灣的地方力量來看，「日治臺北人民面對日本近代帝國的空間支配，也積極地迂迴、轉換、挪用、因應、等待適合的時機重新組織過去的地方社會力量。」（頁49）1920年代在大稻埕登場的以「臺灣」為單位的各種串連人群的組織、機構與運動，如文化協會、大安醫院、臺灣民報、臺北青年會等，這些在近代空間下的地方力量的串連，是臺灣人由古典帝國統治轉向近代帝國統治的迂迴應映、重組勢力的實踐。在日本統治時期，形成了以「臺灣」為範圍的集體認同概念。殖民統治過程中展開了改變臺北空間特性的治理，卻也同時創造出臺灣社會人群結合的新型態。

日本進行殖民地的空間治理時，也伴隨著時間秩序的改造，顏杏如在第二章〈天長節鬥熱鬧：帝國的節日與殖民地臺灣社會〉中，很傳神地用了「鬥熱鬧」一詞來說明本地的文化機制如何接軌於殖民者由上而下推動的新的時間秩序。明

治維新後，年號、立法、標準時、到國家祝祭日，一整套時間制度在日本實施，產生極大的新時間秩序轉換。一方面採用西方「文明的時間」，一方面創造出「天皇的時間」，並將兩者重疊在一起，重新建立新的時間制度與時間意識。日本統治臺灣後，以天皇為頂點、皇室為中心的國家祝祭日，如紀元節（國家神話）與天長節（天皇生日），也成為日本帝國版圖內實行的正式的、官方的時間秩序，屬於帝國的、國家的時間。隨著日本領有臺灣，包含國家節日的新時間制度施行於臺灣，殖民者試圖透過各種方式，如節慶儀典、宴會、閱兵式、懸掛國旗、官廳儀式會場祝賀裝飾等視覺裝置傳遞帝國時間。殖民地社會既存的一些機制，在不同場域和新的國家時間產生連結。除了仕紳的中間機構以及學校外，臺灣人既有的傳統文化與地方社會運作方式，藉由壽慶文化、廟會慶典熱鬧等機制，使得國家節日能與殖民地社會銜接。（頁55）新的時間制度對臺灣社會的影響，也因臺灣社會內部的差異，如身分地位、階級、城鄉等，而有不均質的呈現。多重時間秩序的交錯，而時間秩序也同時呈現空間性。官方建築內部、公共空間、不同民族生活街區、家庭內部私領域，在相同的時間流逝中過著不同系統的時間，有著不同的生活節奏。殖民地臺灣壓縮著不同的時間系統，不同的時間系統在各個場域上演。（頁78）到了1930年代中期以後因為戰爭動員，不同的時間秩序與生活節奏才在總動員的體制中，逐漸被一致化。

在第二部「知識與知識社群的描圖」中包含了3篇論文，針對專業職業社群、語言與媒介，以及跨域左翼國際主義連帶，討論帝國脈絡中殖民地的知識形式與實踐可能性。在第三章〈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中，曾文亮透過辯護士制度以及法律專業主義的登場，探討日治臺灣形成的法律人專業社群、法律職業市場的演變與法庭內外的人權擁護的法律鬥爭。日本統治臺灣之後，引進的司法制度與辯護士之職業社群，在殖民地社會中，因為殖民地特殊性、民族抵抗與職業主義等因素的交互影響而產生複雜面貌。1920年代，日本國內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制度，使通過考試取得資格的臺灣人的辯護士數量成長，在臺灣的法律專業社群中，民族之別受到了殖民地市場的制約，同時在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中也採取不同的對應策略。法律專業主義與國家權力的遠近距離，也影響到專業社群的發展。辯護士社群在法學知識、職業利益與理念方面，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可能發展出職業的認同，即所謂的法律職業主義（legal

professionalism)。日治時期臺灣辯護士社群的歷史經驗，即為法律職業在臺灣的歷史發展經驗。（頁131）

如果媒介即訊息，傳遞知識的語言與媒介本身與知識同等重要的話，李承機在第四章〈殖民地時期臺灣人社會「知」的迴路：語言工具性的「侵佔」與「復權」〉就此一課題，分析殖民地時代各種形式的媒介、語言使用、傳播的訊息與集體認同的形成之間的複雜關係。一方面殖民者強勢的語言政策，使日語成為強勢語言；另方面作為帝國語言的日語，則成為新的工具，帶來新的知的迴路，甚至成為強而有力的公共語。同時，在出版、文字媒體外，1930年代新興的廣播、唱片等口耳媒介，則帶來另外新形式的知的迴路。在文字世界與音聲世界之間，在文字傳播與口語傳播之間，在臺灣人「知」的迴路之間對知的侵占與復權，可說是同一時間發生與進行著。（頁145）李承機以張麗俊、簡吉不同世代的臺灣知識人為例，分析其如何使用媒體，並在漢文、日文與口語傳播中，獲得資訊與運用於動員的經驗。殖民地的經驗顯示，圍繞在「知」的迴路的各種形式與重層的「侵佔」雖然持續發生，臺灣人「知」的迴路的「復權」卻也同時持續進行。（頁158）殖民地時期臺灣人社會「知」的迴路和日本語的工具性是如何構成複雜的交錯關係，這種既對立又交疊的二元性，在殖民地「知」的迴路中，「侵佔」與「復權」的複雜交疊關係，也可以說是殖民地臺灣社會中知識「描圖」的基礎構造。

日語的工具性與公共性，不單單只是在臺灣內部形成傳播經驗的既侵奪又復權的交錯，同時在左翼的國際主義連帶的實踐，在東亞的歷史脈絡中，也發揮了其創造新的知識與實踐迴路的媒介功能，而這完全是帝國意圖之外的結果。在第五章〈左翼文化走廊與不轉向敘事：臺灣日語作家吳坤煌的詩歌與戲劇游擊〉，柳書琴以臺灣人詩人、戲劇工作者、文藝評論家吳坤煌為例，從社會主義的空間網絡而非民族主義的時間序列，闡述一位臺灣日語作家從事左翼文化運動的跨國路徑及其文學特性。做為帝國領域內的公共語的日語，日語不只是日本人的日語，也是臺灣人的日語，它既是臺灣人進入體制向上攀升的工具，也是從帝國內部進行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的武器。在1930年代初期日本思想控制轉趨嚴格，在「轉向」的風潮中，少數左翼文化人仍然持續左翼鬥爭的立場，發展出弱者結盟的連帶，以及創造互相交流的底層經驗的不轉向的少數敘事。透過東亞兩個主要

共同語言，中文與日文，以及帝國邊緣出身的文化人（如臺灣的吳坤煌、中國的雷石榆、朝鮮的金斗鎔），以國際都市東京與上海為據點，形成了跨域的左翼文化走廊。置身國際左翼運動網絡的吳坤煌在1930年代以日、朝戲劇團體合作為基礎，增加了與東京的中國左翼文化人的連結。在《福爾摩沙》雜誌時期，接觸了以東京為主的日本、朝鮮、臺灣的跨民族網絡，擔任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長時，進一步深入到東京、上海的跨國網絡。而其在《詩精神》與三一劇場活動，除了進行左翼走廊的文化媒介活動外，其文學創作所傳達的地鼠族、曠野、沙漠的意像，更是互相輝映、彼此互文，形成一種時代話語。而這些話語，更進一步與邊緣、底層、離散、非人的不轉向者的形象結合，成為不轉向左翼文化人的少數論述。

在第三部「藝術與感情結構的描圖」包含了3篇論文，針對藝術、新興演劇以及文學史書寫，探討在帝國的脈絡中，殖民地的情感結構的多重層面。廖新田在第六章〈美好的自然與悲慘的自然：殖民臺灣風景的人文閱讀——美術與文學的比較〉中指出，殖民地時期的臺灣，視覺藝術產生了從自然到人文的轉移，這其中特別是針對風景的再現與感受。透過比較分析臺灣的視覺藝術家如何發展他們的風景繪畫，以及臺南詩人楊熾昌的超現實主義詩創作和風車詩社，兩者如何在1920年代到40年代間解讀、構思與呈現出不同的臺灣風景視野和觀念，指出兩者共同之處在於都關照臺灣風景和熱帶景觀，但描寫及思考的方法卻大異其趣。風景畫中表現了「自然主義的自然」，超現實主義的文學則在詩中呈現「扭曲的自然」。彼此也有客觀立場與主觀介入的對立。對風車詩社的超現實主義者而言，自然是心智的反射，存在於內在，需要曲解與疏離，從常識到進一步的反思。從比較來看，實證觀念下的自然，著重客觀的呈現，注意風景的外部性，而這與超現實主義的自然觀，強調風景的內部性，扭曲的自然觀是主體加以轉化後的風景觀，形成強烈對比。從石川欽一郎的素描與水彩畫呈現的臺灣風景，到風車詩社楊熾昌的熱帶風景詩的比較討論，凸顯日治時期臺灣的超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一方面回應了同時代的超現實主義的國際潮流，同時在臺灣的脈絡中，透過尋找內在潛意識世界來對應外在世界的遭遇，以及挑戰常識，以另類的文化實踐形式，介入殖民地後期的文化建構。

除了藝術創作外，大眾通俗美學經驗上，日治時代的臺灣，也在時代的條件

中，產生了承載觀眾情感的本土劇種：歌仔戲。在第七章〈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戲院、歌仔戲與殖民地的觀眾〉，石婉舜考察日治時代進入戲院演出的歌仔戲、其演出形式、以及與觀眾形成的情感共同體。1920年代進入戲院的商業演劇的歌仔戲，具有大眾性、通俗性與娛樂性等特質，是觀察殖民地文化現象與社會大眾普遍情感動向的適切窗口。（頁239）歌仔戲是臺灣原有戲曲文化傳統經過現代戲院產業吸納消化後的產物，提供在都市打拼生活的人們最具鄉土性、通俗性的娛樂，從而也體現殖民現代化過程中新興市民大眾的情感動向。歌仔戲在殖民地戲院的階段，實驗創造各種表演形式、採用新興的技術，求新求變與新興市民大眾脈動相連、聲息與共。受到殖民地觀眾普遍歡迎的臺語通俗演劇，正是歌仔戲。戲院內演出提供露天場合所欠缺的現代性經驗。電力、燈光與背景技術的採用，使1930年代戲班在音樂歌曲的創造、運用上勇於創新，且取材相當豐富多元。1920年代至30年代投入歌仔戲市場的戲班，一方面在戲院內急速與其他成熟劇種、演藝、甚至電影文化，一方面也在戲院外跟日趨成熟的唱片業及本土歌仔冊出版市場形成互相啟發、彼此合作的關係。（頁262）同時歌仔戲的即興演出能力，使歌仔戲演員在發揮話劇本領時，除了生動的肢體表現外，更有以本地語言唱唸的表達優勢，與觀眾形成緊密的交流，擴大觀眾對演出的共鳴，形成情感共同體。特別是30年代歌仔戲哭調發展的多元化與受歡迎，也反應了殖民現代化下政治社會變遷觀眾療癒抑鬱心理的集體需求。歌仔戲折射出殖民現代化下新興市民大眾的精神面貌，並與戲院一同成為殖民地都市文化的表徵。（頁274）

帝國與殖民地對位閱讀的歷史比較，李育霖在第八章〈帝國與殖民地的間隙：黃得時與島田謹二文學理論的對位閱讀〉，透過對位閱讀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與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的建構，重新思考文學史，乃至臺灣文學史的意義與可能性。受薩依德的對位閱讀啟發，強調並不預先存在一個支配性的原則控制帝國文化的構成，相反地，殖民者與被殖民之間，各種形式的縫隙穿透，構成殖民地知識的條件與可能性。以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書寫比較，重新探測黃得時的文學理論與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中的不同主題如何互相交織、抗衡與爭勝，並協調導引出秩序的過程，呈現「多聲部旋律」。（頁281）黃得時標示臺灣文學史的「獨特性」與島田謹二設定的「差異性」是很明顯的不同。前者嘗試建造一個文學的歷史傳統，後者則將其依附在日本文學的系統脈絡中。黃得時朝向一個未來

的開放性，其文學上種族融合的概念在後殖民語彙中即是自我衍化的主體化過程。島田則建構統合的日本文學系統，將臺灣文學的特殊性架接在此一同一性體系內。

叁、複數的帝國與多元重層的經驗

論文集中各篇論文共享的問題意識是：「看似分隔卻總是交錯的殖民地經驗經常被研究者忽略，一個獨立於殖民者之外的被殖民『主體』是否可能存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兩者之間如何以某種特定關係與形式彼此作用著？」（頁7）這種交織作用，以及在歷史中形成的被殖民主體，表現在空間社會中新的社會連結形式的產生，或是時間秩序中臺灣人透過自己熟悉的年節喜慶的文化實踐，轉化了國家節日意義，將新的帝國時間轉化為自己熟悉的文化內涵。挪用帝國語言，在臺灣內部形成新的動員機制，或是在國際都市作為跨域國際主義串連的媒介。近代知識與制度促成專業社群與職業主義，甚至在藝術與文學的領域，因為帝國的登場與近代知識的導入，帶來壓迫時也同時帶來解放的可能性，形成新的感覺結構，並使新型態的情感共同體成為可能。

從各篇論文我們可以看到，「文化」並不指向一個封閉排外的語意體系與意識形態系統，同時「歷史」也非全然從屬於既存的民族主義所支配的知識系統。（頁12）轉向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帝國與殖民地，使殖民地時代的多元重層的生活經驗能被看見，複雜交織的權力關係能被描繪出來。透過「殖民地的帝國描圖」，重新理解殖民史，並在全球（或各種「帝國」勢力）的場景中理解臺灣自身的歷史縱深與殖民地的社會構成。

本論文集雖然意識到複數帝國的存在，但在各篇論文的具體分析中，主要還是以近代日本帝國為主要的對象，實際上似乎還是沿襲了以往的軍事與政治擴張、統治政策的研究典範中，日本殖民臺灣，對臺灣的影響的分析結構。換言之，仍然是在單一帝國下的單一殖民地的空間範疇中來討論。部分論文雖已注意到跨越境界的連結，或是在文化現象中的市場資本力量，仍未能使帝國的複數性

有更清楚地呈現，或是使超越政治範疇的其他歷史力量能更被意識到並加以分析，而這些已經萌芽的問題意識，值得接下來進一步地探究。

再者，帝國的東亞擴張，使帝國內的跨域交流成為可能的話，除了論文集中分析的吳坤煌左翼文化走廊外，其他包含人的、物的、思想觀念的各種型態的跨域流動，不限於從殖民地到帝國首都，也包括各殖民地之間，甚至在帝國與帝國之間，不管是具體的或是想像的連結，或許未來的研究，可以在本論文集的基礎上進一步描圖。

肆、結論

歷史中人群的生活經驗經常是混雜與交錯的，種族的劃分、共同體的想像，以及歷史乃至文化系統的構築，都不必然是二元對立的產物。本論文集透過時空意識、知識與知識社群、以及情感結構3部分的討論，嘗試建立新的殖民史圖像、重新思考殖民地在帝國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主體。這種新的嘗試與理論化的努力，應該被鼓勵。面對自身的歷史，重新閱讀，重新捕捉尚未疆界化的文化動能與尚未領域化的歷史力量。這樣的嘗試，不單只是尋求新的研究議題而已，而是在倫理上指向未來。如同論文集編者在序章中指出的，此一與未來的聯繫，要求臺灣的後殖民狀態必須持續被討論。「帝國」在臺灣的討論，並不是重提一個已完結的過去，更不是重複一個前定的未來，而是在持續地討論中，探索在複數的「帝國」經驗中，「臺灣」歷史的未來可能性。